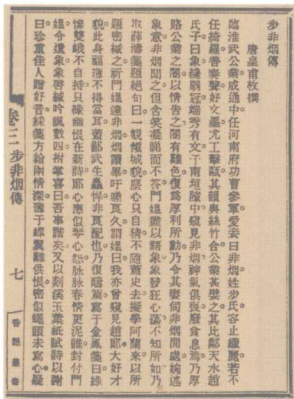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诗与唐人小说

崔际银 著



河北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出版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● 崔际银/著

诗与唐人小说

SHI YU TANG REN XIAO SHUO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与唐人小说/崔际银著. —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
2004.6(学者文丛)
ISBN 7-80696-110-0

I. 诗... II. 崔... III. 小说—关系—诗歌—文学
研究—中国—唐代 IV. I207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0409 号

学者文丛

诗与唐人小说

崔际银/著

出版人/刘文君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)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375 字数 300000

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

ISBN7-80696-110-0

定价:16.80 元

序

李剑国

古云“诗言志，歌咏言”，诗歌无疑是言志抒情最富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形式。因此，从先秦古籍中我们可以看到渔父“沧浪”之歌，楚狂“凤兮”之吟，筑者“泽门”之讴，舆人“原田”之诵，许穆夫人“载驰”之赋，甚至郑庄公母子大隧之会也赋诗言融融之乐。因此，也就有采诗和诗三百的编纂。“哀乐之心感，而歌咏之声发”，诗歌成为人们抒发自身思想感受和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，这是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，因此在小说这样的叙事文本中出现诗歌也就不难理解。最早的杂传小说《穆天子传》所记周穆王和西王母的三首赠答歌谣，穆王的三章“黄竹”诗，与其说是小说家的有意引进，毋宁说是记实——即便只是记述传闻而已。

但这倒形成一种小说叙事传统，即把诗歌纳入小说的叙事框架，诗歌成为小说叙事结构的组成部分。后来当民歌和文人五言诗流行于世之时，小说中也随处可以读到诗歌的吟唱，人仙鬼魅概莫能外。从《穆天子传》的四言

诗、《燕丹子》的骚体诗，到六朝小说中的五言诗，小说中的诗体与时代同步。到唐代，各体诗歌大畅于天下，同时小说创作也进入审美自觉的时代，诗歌介入小说也就从“集体无意识”的惯性动作提升为有意操作。小说作家非常自觉地运用“诗笔”来表达情感、营造意境。这不仅体现在篇幅较长的传奇作品中，即便是短小的志怪作品，作家也善于用隽永有味的一章短诗表达深邃浓郁的情思。自然这些诗歌必须是佳制，实际上也确实如此，诚如前人所说，“大率唐人多工诗，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，莫不宛转有思致”（洪迈《容斋随笔》卷一五）。“诗盛于唐，其作者往往托于传奇小说中神仙幽怪以传于后，而其诗大有妙绝千古、一字一金者”（杨慎《艺林伐山》卷一七）。运用诗歌成为唐人小说尤其是“文备众体”的唐传奇创作的一个表达模式，许多优秀小说家往往把“诗笔”的妙用发挥到极致。我们不能想象，如果《柳氏传》缺了那两首意象生动的“章台柳”赠答诗，如果《异梦录》缺了古装美人那首充满迷惘之思的《春阳曲》，我们品味到的美感要打多少折扣。

尽管《全唐诗》这样的唐诗总集也从小说中辑录神仙鬼怪诗，尽管《唐才子传》也针对“杂传记”中的“鬼神灵怪之词”单列《鬼》一节，分明把鬼怪也视作“才子”，但治唐诗者很少研究它们。道理很简单，这类“鬼物假托”的诗歌既不便当作小说作者本人的作品，更不能把花妖狐魅当作真实诗人。结果可悲的是，“妙绝千古”的诗歌最终在唐诗史中失去地位，其实它们本来也是唐诗的组成部分。研究它们乃是我们小说研究者的任务，只有我们才重视它们的价值。自然，研究它们和研究一般唐诗不同，因为它们借小说文本而存在，脱离不开小说的人物和情节，因为它们常常有着虚拟的作者身份。

我在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前言中曾用不小的篇幅分析过唐小说的用诗问题，这里不妨引用一节：

唐代小说作品中有大量的诗歌成分，大都出自作品中人物（包括

神仙鬼怪)，有很多是极为精妙的佳品。……诗歌在作品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大体有五种情况：一是以诗歌代替人物对话，最典型的是《游仙窟》，完全是舞文弄墨，自炫自娱。二是录入作者或他人题咏作品中人物事件的诗歌，一般同情节发展没有关系。如《莺莺传》的杨巨源《崔娘诗》、元稹《会真诗》，《李章武传》中李助所赋诗。有的则同情节发展有关联，如《非烟传》崔李二生所赋诗。三是鬼魅以诗自寓，如《东阳夜怪录》《玄怪录·元无有》等，乃以诗为戏，以造文趣。四是根据情节需要为人物撰作诗歌，如《传奇·郑德璘》；甚至也未必是情节所必需，只是为增加作品文采而做的点缀，这种情况很常见，如《周秦行纪》。五是根据规定情景通过人物自题自吟或赠答酬对，抒写人物的情绪，或有意识创造抒情氛围乃至意境。上述五端当然都是“以见诗笔”的，但最有审美意义的乃是末一种，因为它造成小说的诗化特征，是小说家审美意识最本质的体现。

这里所讲的唐代小说，主要是针对虚拟性、创作性较强的传奇和志怪小说。唐人小说中还有不少杂事小说，其中常常记载诗人遗闻轶事，也录入大量诗歌，如《云溪友议》《本事诗》等等。其中的诗歌基本都是真实人物所作，相关的故事也只是或真实的传闻或如实记录，并不体现为小说作者的“诗笔”表达。还有不少其他方面的逸事，也经常引入诗歌，情况与之差不多。因此研究唐人小说的“诗笔”问题，自然要基本排除这一块儿，至少不能把二者搅和在一起。前人对唐人小说中诗歌的赞赏，也都是针对虚拟性的诗歌作品。

虽说唐人小说的“诗笔”问题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普遍重视，但际银就《诗与唐人小说》这一课题展开专门研究仍还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他也具备这方面的研究能力。际银原是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（在读博期间晋升为教授），专治唐宋文学，成绩不算小，发表过不少论文，并有专著《唐宋八大家新论》问世。入学后又系统研读了文言小说尤其是唐人小说，可以说对唐代文学有了更完整的把握。他选定这个题目，既发挥了他熟悉唐诗唐文的长处，也是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扩展和新尝试。

《诗与唐人小说》对唐人小说的用诗情况做了全面梳理和概括，并从多种角度做出考察。思路比较开阔，不乏真知灼见，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有深入论述。例如以唐诗发展为参照系，考察小说用诗的变化，就是很有新意的探索。论文的基本观点和成功之处不拟一一细说，但有一点方向性的缺憾应当指出。我曾强调，由于唐人小说类别很多，用诗情况十分复杂，应当注意区别记实性的人物轶事与虚构性作品的“诗笔”，而后者才是论文的“主脑”，是着力所在。如果调整好这样的预设视野，设计出更为合理的框架，就会把问题讲得更集中清晰。自然际银也不是完全忽略了这一点，只是意识还不够清醒明确，处理具体材料的反应不够敏捷，影响到论文整体思路的完善准确程度。

说到诗人轶事，那属于另一个范畴，有它的特殊性，研究角度和“诗笔”问题有别。我的另一位博士生余才林正在研究诗本事问题，目光就集中在杂事小说中的诗人轶事，而绝对排斥那些虚拟“诗人”的故事。

际银作论文时我在美国一所大学从事研究，无法经常交换意见，最后审读论文时也不能详尽具体地提出修改意见。论文答辩也未能参加。论文如果有什么毛病，那是我指导不当指导不力，没有尽到师责；论文的种种好处，那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。

际银在我的历届博士生中是年龄最大的一个，同时也是最勤奋的学生之一。三年苦读，一朝告捷，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，我感到欣慰。论文将要出版，我更为高兴。前辈曾说做学问是件总会落下遗憾的事情，确实如此，翻翻我自己以前出版的论著，不时会发现问题。发现问题证明自己在长进，学无止境，人无完人，只有不断地积累，不断地获取，不断地提高，不断地完善而已。际银在论文《后记》中说过“吾好此道，循行终身”的话，相信他以后会做得更好。

2004年1月29日

目 录

诗与唐人小说

导 言	1
一 论题缘起	1
二 对象范围	5
三 基本构想	15
第一章 唐人小说对诗歌之接受	23
第一节 作者：小说接受诗歌的主导媒介	23
一 小说作者	24
(一) 小说作者身份	24
(二) 小说作者类属	29
二 小说中的诗歌作者	35
(一) 诗歌作者之阶层	37
(二) 诗歌作者之归属	38
第二节 小说接受诗歌的具体方式	42
一 创作诗歌	42
(一) 小说作者之诗	42
(二) 小说人物之诗	44
二 引用诗歌	46
(一) 引用当代诗人之作	46
(二) 引用古代诗人之作	50
三 诗与小说相配	55
(一) 甲作小说而乙作诗歌	56

(二) 甲既作小说又作诗歌	57
第二章 唐人小说中诗歌之分析	68
第一节 诗歌体式与表现形态	68
一 诗歌体裁形式	68
(一) 古体	69
(二) 近体	71
(三) 杂体	73
二 诗歌题材类别	74
(一) 婚姻恋情	74
(二) 咏史怀古	75
(三) 赠答唱和	77
(四) 悼亡哭挽	78
(五) 登临题咏	79
(六) 咏物绘景	80
三 诗歌表现形态	81
(一) 以诗为文	81
(二) 诗文相映	84
(三) 诗化小说	87
第二节 诗歌在小说中的作用	89
一 谋篇布局	89
(一) 引发情节事件	90
(二) 实现承过渡渡	91
(三) 结束总结全篇	93
二 表意抒情	95
(一) 爱情	95
(二) 友情	98
(三) 怨愤之情	99
(四) 出世之情	99
三 成事为媒	101

(一) 用诗获益	101
(二) 借诗成缘	102
(三) 凭诗脱困	104
(四) 因诗招祸	106
(五) 以诗为讖	108
第三章 唐人小说用诗之评价	120
第一节 唐人小说之诗的风格类型	120
一 粗陋型	121
(一) 无才而致粗陋	121
(二) 有意而致粗陋	123
二 通俗型	126
(一) 语俗意显之诗	126
(二) 言浅意深之诗	128
三 典雅型	131
(一) 形或神特出之诗	131
(二) 情与辞谐协之诗	133
第二节 小说接受诗歌之价值	136
一 保存大量诗歌	136
(一) 保存社会名人的诗歌	137
(二) 保存下层人士的诗歌	138
二 演绎诗歌本事	140
(一) 当代诗人诗作本事	140
(二) 前代诗人诗歌本事	145
三 裨益唐诗研究	147
(一) 提供诗坛掌故	147
(二) 概述诗风趋势	148
(三) 钩沉有关事实	149
(四) 纠正各种舛误	151
第四章 唐诗与小说用诗之互观	159

第一节 唐诗及唐人小说发展概况	159
一 唐诗基本流程	160
(一) 古代有关唐诗发展的论述	160
(二) 20 世纪以来唐诗分期说	162
二 小说演变轨迹	163
(一) 三期说	164
(二) 四期说	165
(三) 五期说	166
第二节 “四唐” 诗与小说之诗	168
一 初唐	168
(一) 诗坛的因中有革	168
(二) 低迷状态的小说用诗	170
二 盛唐	172
(一) 诗歌的黄金时代	172
(二) 张鷟小说用诗解析	174
三 中唐	176
(一) 诗人的探索求新	177
(二) 小说与诗和谐融通	178
四 晚唐	181
(一) 诗运的逐步衰退	182
(二) 小说用诗的繁富	183
第五章 唐人小说用诗的向度考察	193
第一节 前承：唐前小说用诗之扫描	193
一 唐前小说及小说之诗	193
(一) 唐前小说概况	194
(二) 唐前小说用诗举隅	199
二 唐前小说用诗简析	206
(一) 用诗分布特征	206
(二) 用诗方式与功能	211

第二节 遗响：唐后小说用诗之点评	214
一 文言小说	214
(一)《青琐高议》与《娇红记》	215
(二)《剪灯新话》与《剪灯余话》	217
(三)《聊斋志异》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	221
二 白话小说	224
(一)短篇白话小说	224
(二)长篇小说	230
第六章 诗与唐人小说融合因缘探究	247
第一节 小说文体的需要	247
一 重视“诗笔”运用	247
二 关注文士生活	253
第二节 小说作家的情结	257
一 小说理念：强调诗意化	257
二 小说创作：逞显才气	262
第三节 唐世风尚的推动	267
一 酷爱诗歌	268
二 崇尚“以诗取士”	272
结 语	289
主要参考文献	295
后 记	314

导 言

诗与唐人小说

本论题属于古代小说研究范畴。具体而言，是以唐人小说为基本材料^[1]，着眼于其中运用诗歌的现象，进而探讨唐人小说与诗歌相互关系之研究。

一 论 题 缘 起

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，唐代文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。这种重要地位的取得，首先源自唐代标志性文学体式——诗歌。对唐代诗歌的研究，自唐以降，代富其人。相关的研究成果，无论是数量之多、范围之广，还是成就之高，都是任何时代、任何文体所无法比拟的。相对于唐诗，唐人小说的研究明显滞后。直到清季，除了胡应麟等人偶有论及之外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几乎没有开始，更谈不上重大进展与突破。

20 世纪初叶，随着小说受到学术界普遍而空前的重视^[2]，唐代小说研究也翻开了新的一页。鲁迅先生是 20 世纪唐代小说研究的奠基者和杰出代表。他批判且打破了清儒轻视小说的旧习，运用现代小说观念与全新视角观照古代小说，先后撰写或编辑了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（上海北新书局 1925 年 9 月印行）、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（见西北大学出版社 1925 年 3 月印行《国立西北大学、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》（二））《唐宋传奇集》（北新书局 1927 年 12 月刊出）等著作；在小说文献整理、价值判断、地位确定等

方面，为后来的唐代小说研究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，指明了正确的方向。此间，还出版了一些唐代（或唐宋）传奇的选本。如胡朴安、胡寄尘选辑的《唐人传奇选》（上海文艺小丛书社 1930 年 5 月初版）、卢冀野选注的《唐宋传奇选》（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11 月初版），其中最见功力者是汪辟疆选编的《唐人小说》（神州国光社 1930 年 5 月初版）。汪氏此著析为二卷，上卷收《古镜记》等 26 篇，下卷收《玄怪录》等 8 篇。各篇后均加按语。书的开头有汪氏《题辞》与《序例》，末尾附有鲁迅《唐小说史略》（节录自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、盐谷温《论唐代小说》等。作为一本搜集比较完备的唐人小说集，此书甚为治小说史者所重视。唐史专家陈寅恪先生，也有若干论及唐人小说的著述，如《韩愈与唐代小说》（英文版载于哈佛大学《亚细亚学报》第 1 卷第 1 期、中文版载于《国文月刊》1947 年 7 月 10 日第 57 期）一文，着力揭示了韩愈及其领导的古文运动与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，对研究唐人小说颇有启发。在陈寅恪、吴宓的指导下，刘开荣于 40 年代中期，完成了在燕京大学历史研究所的毕业论文《唐代小说研究》（1947 年 11 月由商务出版馆出版于上海），成为有关唐代小说研究的第一部专著，代表了 20 世纪上半叶唐代小说研究的最新水平。到了五六十年代，在重印鲁迅、汪辟疆、刘开荣等人著作的同时，新出版了张友鹤选注的《唐宋传奇选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 年版）、汪绍楹校点的《太平广记》（中华书局 1961 年 9 月版），以及《三水小牋》《剧谈录》等若干单行本，为唐代小说研究提供了便利。80 年代以后，唐代小说研究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，发表论文二百六十篇左右，出版研究著作多部。其中吴志达《唐人传奇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 3 月版）、李宗为《唐人传奇》（中华书局 1985 年 11 月版）、程毅中《唐代小说史话》（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0 年 8 月版）、李剑国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（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）、周勋初《唐人笔记小说考索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5 月版）、程国赋《唐代小说嬗变研究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版）等，都是颇

具特色的专著，从不同角度开拓了唐代小说研究的视野与领域。在唐代小说作品整理上，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出版社用力最多。分别校辑出版了《集异记》《博异志》《宣室志》《冥报记》《广异记》《传奇》《玄怪录》（与《续玄怪录》合编）《酉阳杂俎》《大唐新语》等著的单行本。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《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》（2000年3月版）共收小说39部，基本囊括了唐五代时期的重要小说集。本期在唐代小说总集编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相继出版了《全唐小说》（王汝涛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）和《全唐五代小说》（李时人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）^[3]。

与此同时，海外的有关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。在台湾，唐代小说研究是一门“显学”。据统计，自1950年到1999年，台湾共出版唐人小说研究专著21部，学位论文54篇（其中博士论文6篇，硕士论文48篇），论文282篇。其研究队伍、论著数量及学术影响，皆与唐代诗歌、散文研究不相上下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。20世纪50年来的台湾唐代小说研究，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：五六十年代是萌生期。研究队伍的主体是从大陆前来的老一辈学人台静农、王梦鸥、钱穆等，以及他们在60年代培养出的首批弟子。此时的研究，多着眼于考据、校补等版本学或文献学方面。如王梦鸥《续玄怪录及其作者考》《略谈续玄怪录的编纂》，罗联添《刘宾客嘉话录校补及考证》、祝秀侠《唐传奇研究》等。70至80年代是台湾唐人小说研究的鼎盛期。此时研究成果丰硕，研究队伍整齐，研究领域广阔，这一大好之局面的奠基与开拓者是王梦鸥。王梦鸥是台湾专门致力于唐代小说研究的第一人，自70年代起，出版了大批关于唐人小说研究的论著。如其代表作《唐人小说研究》（1-4集）《唐人小说校释》（上、下），不仅为台湾治唐人小说者所必读，在大陆也深受好评。他的弟子罗宗涛、王国良等人，在敦煌变文研究及唐代小说版本学、目录学研究方面，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。罗宗涛的《敦煌讲经变文研究》、王国良的《唐代小说叙录》《近五十年台湾地区唐

代小说论著目录》等，都是颇见功底之作。刘瑛的《唐代传奇研究》分为上下篇，上篇总论、下篇分论，对唐代小说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阐释。90年代以来，台湾唐代小说研究进入了多元新变期。此时的研究，除少数人继承王梦鸥开创的治学方向，继续对唐人小说进行校订、考释之外，更多的则转向对内容的理解与结构的分析。如刘瑛《唐代传奇研究》（续集）、傅锡壬《唐人笔记小说中“牛李传闻”的解析》、刘燕萍《爱情与梦幻——唐朝传奇中的悲剧意识》等，在研究视角与方法上，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^[4]。

在海外唐代文学研究领域，日本占据着重要地位。日本学者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唐代诗文，有关唐人小说的论著较少。但是，就现代意义上的唐代小说研究而言，日本比中国开展得更早，盐谷温的《中国小说史》堪称前驱。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内山知也《隋唐小说研究》、近藤春雄《唐代小说研究》，是日人唐代小说研究的代表作。韩国也是重视唐代文学研究的国家，其中张基槿《传奇小说研究》、丁镇范《唐代传奇研究》、金铉龙《朝中小说说话比较研究》，是韩国唐代小说研究的标志性著作。唐代小说在欧美产生重大影响，应归功于荷兰作家高罗佩（Gulik Robert Van, 1911—1968）。他曾任荷兰驻华公使，精通中国文化。1949年，高罗佩翻译了一本中国历史小说《狄公案》。为了解脱因翻译而造成的束缚，他于1950至1958年间，先后构思创作了五本中国侦探小说，其主角皆为唐代名臣狄仁杰。他的《狄公案》系列侦探小说用英文写成，并被译成荷、法、德等多种文字。高罗佩的创作，可以视为唐代小说研究的一种延伸。对唐代小说本体的研究，在欧美亦不乏其人。如〔美〕倪豪士《传记与小说：唐代文学比较论集》、〔美〕马幼垣《唐传奇里的现实与幻想》、〔美〕柯蒂斯·艾德金斯《唐代传奇故事的主角》、〔波兰〕塔德乌什·日比科夫斯基《唐代短篇小说集》、〔苏联〕波兹涅耶娃《论“西厢记”题材兼论元稹“莺莺传”》、费什曼《唐代传奇集》诸

作，都有其独到之处。至于有关敦煌文献（其中可视为通俗小说者不少）的研究，在英、法、俄、美、日诸国拥有众所周知的优越条件，故而成果颇丰，这里就不再详述了^[5]。

通过以上的粗略梳理可知，唐代小说研究近几十年来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。其中本体研究（如作品的搜集整理、注释考据等）及纵向研究（如编写小说通史、小说体类史）更为充分。相对而言，横向比较研究较为薄弱。比如，对于唐人小说中大量运用诗歌的现象，虽有不少论者言及，但尚有拓宽进深之余地。因此，具体分析唐人小说运用诗歌之情状、深入探讨诗歌与小说间的关系，即为本项研究确立之因缘意义。

二 对象范围

严格说来，本课题既然以《诗与唐人小说》立题，且将“唐人小说”作为基本坐标，其对象应当是唐世的“全部”小说。然而，事实上很难做到。其主要原因是，迄今没有一个为学界公认的划定古代小说的标准（古代小说之标准，当然适用于唐代小说）。这种情形既体现在理论阐释方面，也体现在作品的区分编辑方面。从根本上讲，这是一个事关指导思想的理论问题。

在理论上，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“什么是小说”？对此，古人或无意、或有意地曾做过探究。根据统计分析，中国古代关于小说的定义达七种之多：其一、非道术所在的琐屑之言（据《庄子·外物》）；其二、治身理家的丛残小语（据桓谭《新论》）；其三、凭借街谈巷议、道听途说而编著的书籍（据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；其四、对医巫厌祝之术的记录（据张衡《西京赋》）；其五、野史、外乘或外传（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刘知几《史通·杂说》）；其六、宋代说话中的短篇故事，又名银字儿（据吴自牧《梦粱录·小说讲经史》）；其七、一切纪实的或虚构的人物故事（据冯梦龙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之“序言”）^[6]。这七种说法的前四种，